

第五章

對外關係

在明末清初交替之際，西歐人開始到達中國；差不多同一時間，俄羅斯人也穿越西伯利亞進至滿洲邊境，然而兩者毫無關連。隨著這種前所未有的東西方之間的接觸，中國與外部世界關係的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西歐人的來臨

地理大發現時期的歐洲洋溢著一種新的冒險精神，帝國的貪欲、基督教擴展到異教（即非西方）世界的傳教熱情，以及尋求香料貿易的商業探索，助長了這種冒險精神。在「航海家亨利親王」（Prince Henry, 1394-1460年）的贊助下，葡萄牙船長起而探索人們知之甚少的非洲大陸。1487年，迪亞士（Bartholomeo Dias）繞過了好望角。幾年以後，1492年，西班牙資助哥倫布（Columbus）向著一個相反方向航行，這次航行不期而然地發現了美洲。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間的競爭非常激烈，教皇亞歷山大六世（Alexander VI）於是出面干預，發佈著名的1493年5月3日和4日通諭（這些通諭由一年後的《托爾德西拉斯條約》〔Convention of Tordesillas〕加以確認），並在他們之間劃分了尚未被勘察的世界——葡萄牙得到巴西和大部分東方的非基督教世界，而西班牙則得到大部分美洲、太平洋、菲律賓和馬魯古。依據這一探險範圍的瓜分，伽馬（Vasco da Gama）於1498年經好望角抵達了印度，由此開闢了通向東方的航線；葡萄牙人、西班牙人、荷蘭人和英國人相繼來到了亞洲。

探險家和商人 在那個時代，地理探險家與帝國建立者之間沒有太大分別。阿爾布克爾克 (Alfonso d'Albuquerque) 在1510年佔領果阿 (Goa) 及在1511年佔據馬六甲，奠定了葡萄牙帝國在東方的基石，並且控制了通往馬來亞和東印度群島香料產地之入口。葡萄牙人在馬六甲遇見了中國商人，這些商人運載著絲綢、錦緞、瓷器和珍珠前來換取香料、生薑、薰香和金線。葡萄牙人開始考慮前往中國。1516年，佩雷斯特雷洛 (Rafael Perestrelo) 乘一艘歐式帆船來到了中國；他從這趟生意中獲利甚豐，也許他是第一位出現在中國的葡萄牙人。中國人將葡萄牙人叫做「佛郎機」，乃是阿拉伯人對歐洲人的叫法「弗林吉」(Feringhi) 之訛音。「弗林吉」源自十字軍中「法蘭克人」(Franks) 的稱謂。

1517年，比勒斯 (Tomé Pires) 受葡萄牙國王之遣作為往聘明廷的使臣，而果阿市長安德拉德 (Fernaõ d'Andrade) 也被授命勘測中國沿海。二人相偕於是年9月率八艘船來到廣州，他們從船上施放了一陣雷鳴般的禮炮——這是他們到中國的第一個舉動，卻令中國人大為震驚，因為中國人不懂這陣響炮的意思。但中國總督¹還是頗為友善地接見了他們，並允許他們碇泊在上川島(即西人所謂之聖約翰島)。

大批葡萄牙人的船隊陸續前來，居駐到上川島、浪白和澳門。1535年，葡萄牙人用行賄手段，獲取中國人正式同意他們在澳門曬晾貨物，從而獲得了在那裏居住貿易的法定認可。葡萄牙人同意每年為其船貨交課2萬兩關稅，並支付每年1,000兩的租金，到1582年(?)，在他們的一再請求下，租金降到了500兩。² 中國並沒有割讓澳門的領土，但到1557年時，葡萄牙人竟自行委任了官員來管轄澳門，把它當成一塊殖民地一樣。明廷沒有提出抗議，相反在1573年沿狹窄的澳門地峽修築了一道城牆，派兵丁守禦，表面上是為了制止綁劫中國苦力的情況，但實際上是為了監視葡萄牙人和限制他們擴展地盤。這個舉動不啻是承認了葡萄牙人盤踞澳門。隨著葡萄牙人穩穩地佔據了澳

¹ 陳金。

²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臺北，1963年)，第1卷，第117-118頁。

門，他們壟斷了中國在廣州的對外貿易，且努力排斥其他外國人從中分享利益。

葡萄牙船隊從馬六甲和東印度的香料貿易中帶回的財富，使西班牙人垂涎欲滴。哥倫布發現美洲的經歷，令西班牙人相信向西航行繞過美洲大陸的最南端可抵達東方。1519年，一名效命西班牙國王查理五世 (Charles V) 的葡萄牙航海家麥哲倫 (Ferdinand Magellan)，率一支五艘船的探險隊沿美洲大陸東岸南航，駛入了太平洋。經過三十三個月的航行，抵達了呂宋 (後來稱為菲律賓群島)，完成了歐洲船舶第一次從美洲航至東方的行程。麥哲倫和大部分隨行人員被當地土著殺死，倖免逃生的人於1522年經印度洋和好望角返回西班牙。

隨著科爾特斯 (Cortés) 征服墨西哥，西班牙人擁有了一個可由此前往亞洲的據點。1564年，黎牙實比 (Miguel Lopez de Legazpi) 受腓力普二世 (Philip II) 之命從墨西哥出發佔領了呂宋，並將該地改名為菲律賓群島，以馬尼拉為首府。

與此同時，有許多中國人在西班牙人佔領的這塊地方從事利潤豐厚的貿易。然而，海盜的問題越來越嚴重，1574年，中國海盜林鳳率領62艘戰船和2,000人攻打馬尼拉。西班牙人擊退了他們，進而燒毀了他們的船艦，這樣就使受命從福建出發追剿這批海盜的中國水師提督頗為感激。西班牙人抓住這個機會發展同中國的關係，邀中國提督前來馬尼拉。1575年，由兩名奧古斯丁會傳教士³組成的一個西班牙使團隨中國水師一道返回了福建——這是兩國間的第一次官方接觸。中國當局很好地接待了西國代表，並允准西班牙人在福建和浙江沿海通商，但不能像葡萄牙人在澳門那樣擁有定居點。從此時起，福州、廈門、泉州與馬尼拉、墨西哥和西班牙之間的貿易便興隆起來了。

因為菲律賓歸墨西哥管轄，所以採用墨西哥銀元為交易媒介。西班牙銀元和秘魯銀元也有使用，但數量較少。這是墨西哥銀元流入中國口岸之始。因為西班牙人來自呂宋，所以中國人稱他們為「呂宋人」；有時也稱「佛郎機」(法蘭克人)，主要是中國人分辨不出西班牙人與葡萄牙人。

³ 馬林 (Geromine Marin) and 拉達 (Martin de Rada)。

1626年，西班牙人襲取臺灣的雞籠(基隆)，並在淡水建立了一個通商和傳教的基地。他們在那裏一直呆到1642年被荷蘭人趕走。

荷蘭人於1604年抵達中國，晚西班牙人約三十年，晚葡萄牙人九十年。促使荷蘭人作積極推進的因素，是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感和新教改革精神。荷蘭人曾受西班牙的統治，但在1581年成功地擺脫了它；因此，西班牙國王腓力普二世(他也統治著葡萄牙)在1594年以禁止荷蘭人出入里斯本(Lisbon)港口作為懲罰，這樣就剝奪了荷蘭人在香料貿易中分享的利潤。荷蘭人於是決定自己前往東印度，一名多年在東方與葡萄牙人共事的荷蘭人林斯哥敦(J. H. van Linschoten)提供了有關商業活動的必需資訊。1595年，阿姆斯特丹的商人組織了一家私營性的東印度公司，勘探通往東方的航路。1596年，豪特曼(Cornelius Houtman)率先首航前往蘇門答臘和爪哇。

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成立，並從政府方面獲取了擁有軍隊、使海外領土殖民化、與東方諸國開戰及媾和等權力。荷蘭人從葡萄牙人那裏奪取了蘇門答臘、爪哇和馬魯古，並獲得了與德川幕府統治的日本通商的權利。1619年，偉大的組織者和帝國創建者昆恩(Jan Pieterszoon Coen)在爪哇建立了巴達維亞(Batavia)政府，該政府成為荷蘭在東方之事業的中心，荷蘭的事業涵蓋了從印度到日本的一個龐大的區域。

荷蘭人在明朝時被葡萄牙人排斥在廣州之外，隨著1644年清朝的建立，荷蘭人對貿易的期望又恢復了。1656年，荷蘭從爪哇派出了兩名使者⁴前往北京。兩人接受朝貢使臣的身分，向順治皇帝行叩拜之禮，並將禮物當作貢品呈上。清廷允准荷蘭人每八年經廣州前來朝貢一次，貢使規模限定為四艘船和100人，其中的20人獲准前去北京。

荷蘭統治臺灣始於1642年，但在1662年突然結束了。是年，一直以廈門為基地進擊中國沿海地區的大明遺臣國姓爺突襲臺灣島，趕走了荷蘭人。在1683年平定臺灣之後，清廷恩准荷蘭人到廣東和福建行商及每五年朝貢一次。

伊麗莎白時代的英國人充滿擴張的野心，他們自然不甘在香料貿

⁴ 哥貢(Pieter de Goyer) and 開澤(Jacon de Keyser)。

易競賽中落後。1600年，英國女王頒發了一份為期十五年的特許狀給「從事東印度貿易的倫敦郡長及商人」——這一小幫人便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發起者。隨後，一支五艘船的艦隊在蘭開斯特 (James Lancaster) 和戴維斯 (John Davis) 的率領下前往蘇門答臘和爪哇，這標誌著英國在東方的商業帝國之開端。在此後的歲月裏，東印度公司迅速在關鍵的貿易站點建立了一些叫做「商館」的機構。由於英國人在東印度與荷蘭人利益衝突，而在澳門又有葡萄牙人與他們作對，因此他們便將注意力集中到了印度。

正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被不加區分地叫做「佛郎機」(法蘭克人)一樣，中國人稱英國人和荷蘭人都是「紅毛」。因此，荷蘭人在公海上幹下的劫掠勾當就引起中國人對英國人的憤慨。此外，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指望長時間地壟斷廣州貿易，也千方百計詆毀英國人。這樣，中國人從一開始就對英國人有了一個極壞的印象。

在平定臺灣以後，康熙解除了海禁；1685年在四個地方開設了海關：廣州、漳州(在福建)、寧波和雲臺山(在江蘇)。在這幾個口岸中，廣州因地近南海而最為繁榮，1699年在此地開設了一間英國商館。

法國在東方建立其利益的試圖受到了內部傾軋的困擾。1604年，國王亨利四世 (King Henri IV) 向法蘭西印度公司頒發了一份為期十五年與東印度進行壟斷貿易的特許狀。該公司無所作為，且不久又出現了一個與之競爭的組織——主要雇用荷蘭人操辦其船隊。到1719年時，所有的東方貿易都給予了一間叫「印度公司」的新機構。1728年，該機構在廣東設立了一間商館，但在整個十八世紀裏，法國的貿易始終是無足輕重。

總的來說，在華外國商人大多是些追逐盈利的冒險家和一些沒什麼文化的粗人，他們的表現很不體面，尤其是粗暴而放肆的舉止，加強了中國人把外國人看作是化外蠻夷的觀念。中國雖然不歡迎他們，但仍然容忍下來，主要是想利用他們來作為皇帝以德懷遠的一個標誌。自高自大而又自給自足的中國人，拒不承認對外來產品的需求；被圈禁在沿海幾小塊地方的外國商人，對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沒有起到什麼建設性的作用。影響較大的反而是那些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

傳教活動 隨著發現通向東方的新航路，天主教會 (Catholic Church) —— 自宗教改革以來一直萎靡不振 —— 的成員也尋求到海外去傳播信仰。由羅耀拉 (St. Ignatius of Loyola) 在1540年創立的耶穌會 (Society of Jesus)，尤其熱中於向東方傳播福音，這種熱情是一所新建的修道會自然會產生的。沙勿略 (St. Francis Xavier) 先到日本引進天主教後，也懷著讓中國人皈依天主教的夢想前來中國，但於1552年死在令他充滿希望的國度之大門口。擁有民法博士頭銜的義大利籍耶穌會士范禮安 (Alessandro Valignano)，曾供職於教皇保羅四世 (Pope Paul IV) 的教廷，1573年被委任為所有在東印度 (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 的耶穌會傳教團的佈道長。1574年，他率領41名耶穌會士離開里斯本，1577年抵達了澳門。范禮安是一位資質超群、才華卓越的人，他規定了一套在中國活動的新規矩。他不再像當時傳教活動習慣做的那樣，把基督教當作一種外來宗教，強迫皈依者取基督教的名字和穿戴外來服飾，相反，他認為基督教應像酵母般循序漸進地進入中國，並從內部來改造中國。「歐洲至上主義」應讓位於文化的接納。在華耶穌會士受命學習讀、寫、說漢語，以便讓自己「漢化」而非讓皈依者「葡萄牙化」。⁵ 兩位義大利籍教士羅明堅 (Michele Ruggieri) 和利瑪竇 (Matteo Ricci) 被遣為先行者，去執行這一政策和繼續沙勿略的未竟之業。

羅明堅和利瑪竇於1583年定居到廣東肇慶。為準備開展有效的傳道工作，他們改穿中式服裝、學習漢語、採用中國式的行為舉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條。⁶ 他們首要的目的不是爭取信徒，而是為基督教 (Christian) 爭取一個在中國社會中被接受的地位。他們不去強求使每年受洗人數翻幾番之類含糊不確的統計性成就，而是致力於通過廣泛的情感接觸來傳播基督教的理想和觀念。憑藉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學識，以及在天文、算術、地理和其他科學領域的造詣，他們結交了一

⁵ George H. Dunne, S. J., *Generations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1962), 17.

⁶ 不過，應該指出的是，他們反對宋代理學，認為這是一套攙雜虛假的哲學形式，歪曲了孔夫子的教導。

些較為開明的中國士大夫。中國人對諸如鐘錶和天文儀之類的歐式機械、透視繪畫技巧及歐式雕塑，印象深刻。利瑪竇得悉中國人不知道宇宙構造，於是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但不經意地把美洲畫在了左面、歐洲在中間而亞洲在右面。這是一個失誤，因為它挑戰了中國乃中央之國的觀念。自然地，這幅地圖沒有馬上贏得認同。幸運的是，這個錯誤是很容易改正的；利瑪竇知道地球是圓的——而非像中國人仍堅信的是方的——於是修改了地圖，把中國放在中間。最終這幅地圖獲得了中國人的高度稱讚，並在中國廣為流傳，也為傳教士們贏得了很高的聲譽。

與此同時，羅明堅用拉丁文寫了一本自稱為「教義問答錄」的佈道書。在利瑪竇和一位中國學者的幫助下，該書翻譯成中文，並在1584年以《天主聖教實錄》的書名出版。該書也許是在中國出現的第一部基督教文獻，討論了上帝的存在及其特性、靈魂的不滅、自然法、受洗聖禮等等。

雖然羅明堅和利瑪竇與來訪的中國人誠心誠意地討論宗教問題，但兩人仍是謹慎地在開始時把自己裝扮成學者和科學家；因為他們明白爭取別人的皈依才是最終目的，所以不能操之過急，否則會弄巧反拙。利瑪竇成功地確立了自己作為一個中國通、著名的世界地圖繪製人、算術、天文和其他科學真理的教師，最後才是一名天主教傳教士的身分。利瑪竇在肇慶和韶州呆了十五年，在南昌和南京呆了五年，在士大夫名流中結識了許多朋友，然後，於1601年前往北京尋求皇帝的恩寵。他向皇帝呈獻了許多禮品，包括名畫「路加指認聖母」的複製品、一幅「聖母懷抱聖嬰耶穌與施禮者約翰在一起」的畫像、一本天主教祈禱書、一座珍珠鑲嵌十字架、兩副望遠鏡、一張西琴、兩座報時鐘和一幅萬國志（即世界地圖）。還有一份由利瑪竇的一位朋友和仰慕者⁷潤色加工過的漢文表章，與這些禮品一道呈上。這份表章延請了所能找到的最好的書法家謄寫，利瑪竇在表章中稱：「逖聞天朝之聲教文物，竊願沾被餘溉，故辭離本國，航海遠來，歷時三年，始達廣東；因僦居而習華文及經籍，淹留於中國各地凡二十年；現徑趨闕廷

⁷ 劉東星，此公有工部尚書和都察禦史的官銜。

表遠臣慕義之忱，並冀效命云云。」他還寫道：「從幼慕道，訖未婚妻，都無繫累，他非所望」；又云：「本國忝列科名，已叨祿位，天地圖及度數深測其秘；倘皇上不棄疏微，得於至尊之前罄其愚昧，則不勝感激待命之至！」利瑪竇及其同道在「會同館」受到了很好的禮遇。儘管他們從未得瞻天顏，但卻獲准居住在北京請求皇帝批准其在中國開展傳教活動。

利瑪竇的策略是進行和平滲透、採取文化接納姿態，並避免與中國人的偏見和懷疑發生無謂的衝突——他旨在通過這些手段，贏得一些優秀的基督徒，而非做一些無所實效的洗禮儀式。按他的現實主義思路，他認為上帝的恩惠並不是在真空中施捨，而是要借助於人類的活動。因而，他奉承宮中太監的行為也就無所不妥的了，這樣做有助於基督教的事業。通過這條門路，利瑪竇迅速在北京顯赫的士大夫中贏得了朋友和仰慕者，其中有一些達官貴人，包括至少一位內閣大學士⁸、一位吏部尚書⁹和一位禮部尚書。¹⁰最著名的皈依者自然是工部司事李之藻（取教名為利奧〔Leo〕）（卒於1630年）和翰林院學士徐光啟（取教名為保祿〔Paul〕）（1562–1633年），徐光啟後來擢升至內閣大學士。

利瑪竇以一名學者和科學家的聲譽，吸引了大批仰慕者前去他的寓所，聆聽他關於科學、哲學和宗教的宏論。每天拜訪他的人有二十到一百人不等，他的寓所車馬盈門。他生命中的最後九年尤其風光：他與中國人彼此之間已非常熟悉，因此中國人不再把他看作是一個洋人而是一個自己人。但是，他為這樣的聲望和美譽也付出了代價；他在北京每天需要應付的繁重事務損害了健康，最終死於1610年。他的使命由好幾代虔誠敬業的耶穌會士繼承下去。¹¹

⁸ 沈一貫。

⁹ 李泰載。

¹⁰ 馮琦。

¹¹ 在他們中間最著名的有龐迪我 (Diego de Pantoia)、熊三拔 (Sabbathinus de Ursis)、艾儒略 (Julius Aleni)、湯若望 (Adam Schall von Bell)、南懷仁 (Ferdinand Verbiest)、徐日昇 (Thomas Pereira)、張誠 (Jean-François Gerbillon) 和蔣友仁 (Michel Benoist)。

天主教在中國興旺起來：1640年時教徒的總數在6至7萬之間，到1651年數目增至15萬人。¹² 1642年，有五十個宮中命婦成了基督徒，而當桂王稱帝繼續抗清時，他的皇后、王子、兩宮太后和幾個高級官員都信奉了天主教。兩宮太后中的一位——教名為海倫娜(Helena)——甚至在1650年向教皇英諾森十世(Pope Innocent X)送了一封信函，而另一位太后則致函耶穌會會長，請求為大明基業祈禱。¹³

清朝並未因耶穌會士為明廷效命而懲罰他們；事實上，對宗教有強烈傾向的順治皇帝有好幾年對傳教士關係密切，尤其青睞湯若望，任命為宮廷曆法師，賜給許多恩惠和尊號。1653年湯若望榮膺「通玄教師」的封號，1657年又被賜予「欽天監監正」官爵。1656-1657年間，順治皇帝拜訪了湯若望二十四次，甚至於1657年在湯若望的館舍設宴慶祝自己的生日，次年湯若望被擢為一品光祿大夫。

康熙朝初年出現了逆轉，其時本國臣工對洋人在中國佔據高位憤懣不已。攝政大臣鰲拜以漢人曆法師楊光先替代了湯若望的欽天監監正職位。然而，康熙皇帝親政後，於1669年撤掉了楊光先的官職，而任命南懷仁(Ferdinand Verbiest)為欽天監監正。康熙熱中於西洋科學和數學，時常請耶穌會士講授這類學科。這是西學和基督教在中國大為昌盛的一段時期：全國各地都建起了教堂，信徒人數持續增長。前景固然很輝煌，但不久後，教會內部便產生了不和諧的因素，有可能使所有成就毀於一旦。

耶穌會影響的衰落：禮俗之爭 利瑪竇和他的追隨者認為，只要中國人的情感和習俗不與教會的基本教條相矛盾，那麼就可以避免與中國人發生衝突。他們接受已有的漢語詞語來表達基督教的概念，把儒家的道德概念與基督教的學說聯繫起來，克制自己不去干預中國人的祭孔和祭祖儀式，允許信徒行表示尊敬的磕頭禮節。總之，他們接受了文化調和的原則，排斥自地理大發現以來在其他許多宗教會社中間流行的「歐洲至上主義」。

¹² Dunne, 212, 314.

¹³ 送信人是波蘭籍耶穌會士葛彌格(Michael Boym)。

方濟各會 (Franciscan) 和多明我會 (Dominican) 等一些「歐洲至上主義」修道會把非基督教文化看作是邪惡的產物，把對這些文化的容忍看作是對基督教原則的背叛。這些修道會的傳教士抨擊耶穌會士損害了羅馬天主教信念的完整性，並誤導了在中國的基督徒。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僧侶不願對中國人的敏感情緒或當地環境作讓步，而是試圖將在歐洲和西班牙屬地內得到遵守的所有教會法律和習俗，連同信仰原則一起加諸信徒身上。

1634年，多明我會士迪亞斯 (Francisco Dias) 和方濟各會士迪奧斯 (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 抵達了中國，三年後他們會合了另一位方濟各會士亞歷山大 (Gaspar Alexda)。他們對所見所聞大為吃驚：掛在北京耶穌會教堂的「基督和十二使徒」畫像上人物都穿著鞋；這座教堂本身還供奉著兩個「聖壇」，一為基督壇，一為皇帝壇。他們斥責耶穌會士歪曲了基督和使徒的畫像，並將異教皇帝提升到與救世主平起平坐的位置。他們根本不知道中國人對光腳人物有什麼樣的感受，也不費心去瞭解這座教堂是皇帝賞賜給利瑪竇的一件禮物，而為表示耶穌會士對皇帝的感恩，在桌上擺了一塊寫著「皇帝萬歲」字樣的木質匾額。方濟各會士和多明我會士抨擊耶穌會士的罪狀有：(1) 不恰當地使用基督教術語；(2) 容忍中國人祭奠祖宗、新亡者和孔子這類受質疑的儀式；(3) 拒絕斥黜孔子；(4) 沒有公佈教會法律，也不宣揚基督受難之事迹。

用漢語表達基督教思想的問題是爭吵的一個主要焦點。利瑪竇選擇漢語中一些最相近的辭彙來表達基督教的概念，而不是音譯西方的術語。例如，拉丁詞“*gratia*”就不是音譯成「格拉基亞」，而是翻譯成「天恩」或「聖恩」。他把漢語中「天」的概念等同於基督教中“*God*”的概念；這樣，「天主」或「上帝」就等於“*God*”或“*Lord*”，「天使」等於“*angel*”，而「靈魂」就等於“*soul*”。¹⁴

有關禮俗問題的爭論則更為尖銳，利瑪竇和耶穌會士認為在祖宗

¹⁴ 這裏應附帶說一下，這種方法即便是在他自己的修道會中也遇到了一些反對：少數幾個耶穌會士，如龍華民 (Longobardo) 等人，也寧願用拉丁語 *Deus* 的音譯來表示上帝。

牌位前所行的禮俗是表達崇敬和尊重的方式，所以允許在屋子裏擺放一塊寫著家族祖先姓名的牌位，周圍擺一些鮮花、香燭和香爐。他們認為，中國人並不假設他們的祖先附身在這些牌位上；並承認祭祖禮俗只不過是一種表達個人之尊敬和孝道的禮節行為而已，其中沒有什麼迷信的成分。同樣，利瑪竇認為焚香也只是一種不帶宗教含義的社會習俗。其他修道會的許多傳教士認為，在祖宗牌位和新亡者靈柩前磕頭是一種崇拜舉動，只有上帝才配得上享用，而耶穌會士則將之解釋為一種尊重禮儀和表示禮貌的標誌，旨在勸慰悲痛者並顯示哀傷，沒有什麼宗教意義。他們覺得兒女向父母磕頭或臣子向皇帝磕頭的舉動，不含任何宗教或瀆神的東西；耶穌會士自己在接受御賜賞品或聽宣聖旨時也行磕頭禮。他們也容忍為表達對孔子這位萬世師表的習慣性尊敬，在授予「秀才」頭銜時舉行簡潔的祭孔儀式。但是，耶穌會士也劃了一條不得逾越的界限：中國的天主教信徒不得參加鄭重其事的祭孔典禮，因為在這種場合會舉行牲祭儀式。舉行隆重祭奠家族祖先的儀式是可以的，但須有條件，即不得燒化紙錢，不得向死者禱告或祈求，也不得表達死者的靈魂會因攝取供品而受益一類的意念。¹⁵

耶穌會士之所以形成這些決議，是因為他們相信，中國士子階層中的大部分人把遵守禮規看作是恪守臣道的組成部分。禁絕禮俗將使他們不可能成為基督徒，並將導致和平滲透的策略失靈，基督教將不會成為在中國社會內部默默起作用的酵母，反而會與中國的生活方式相敵對。於是，1656年的教皇敕令允准在耶穌會士所規定的條件下履行禮俗。

然而，禮俗問題並未歸於沉寂，而且繼續困擾著歐洲的思想界和宗教界，並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一些最主要的神學家和哲學家也參與到爭論之中，圍繞這個論題出版了262部著作，另外還有一百來部書沒有出版。1704年，教皇改變教會的立場，取締禮俗，禁止用「天」或「上帝」來表示“God”，而贊同使用「天主」一詞。

1715年，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 (Pope Clement XI) 發佈了 *Ex Illa Die*

¹⁵ Dunne, 292.

教令，重申反禮俗立場，警告違令者將被革除教籍。該教令使「皇帝—教皇」關係更加緊張。為避免進一步的糾纏，康熙決定，所有傳教士，除那些科學家和匠師如宮廷曆法師等以外，一律遣送回國。儘管這道上諭並未嚴格履行，傳教士的地位還是變得越來越不妙了，而到了雍正朝時則更是進一步惡化。這位新君不喜歡耶穌會士，因為他們曾支援康熙的第九子同他爭奪皇位。他宣稱：「中國自有中國之道，西洋亦有西洋之教法。西洋教法無需在中國傳播，恰如中國教法無由流傳於西洋一般。」在雍正帝治下，天主教禁令的執行要嚴格得多。

1742年，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 (Pope Benedict XIV) 再次申令反禮俗立場，在華傳教士被置於雖然不是無法生存但也是極端困難的境地，他們的工作和影響跌落到一個低潮。隨著1773年耶穌會的解散，在華天主教的那種感人的精神便煙消雲散了。

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 從晚明時期到清朝中期，共有約500名耶穌會士來華，其中有80人對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人從他們那裏學到了大炮鑄造法、曆法、繪圖、算術、天文、代數、幾何、地理、藝術、建築和音樂。與此同時，耶穌會士也將中華文明介紹到了歐洲。這是近代時期中國與西方的第一次接觸，為中國提供了使其自身現代化的機會。以下所列是耶穌會士對科學技術的一些重要貢獻：

1. 鑄造大炮。中國人從荷蘭人那裏第一次知道了大炮，馬上給它起名為「紅夷炮」。中國人過於傲慢，以致不願採用這種洋武器，結果在1592-1597年間日本侵略朝鮮之役中吃了虧，其時日本侵略者使用了大炮。稍後，受滿洲人勢力崛起的威脅，明廷收起了驕傲，於1622年聘請在澳門的耶穌會士為明軍鑄造火炮。禁止天主教的活動就迫不得已地自然鬆弛了。1642年，湯若望受邀前來鑄炮，並向負責造炮的中國官員教習技術。他造了二十門試用炮，甚得皇帝的稱讚，受命再造五百門。湯若望還寫了一本關於火炮鑄造和操作及炮彈、開礦和火箭等方面的書。在他的指導下，徐光啟、李之藻等輩中國人掌握了鑄炮的技術。
-

2. 曆法。除了火炮外，耶穌會士還帶給了中國有關天文和曆法的新知識。中國有兩部並用的曆書：一為劉基以元曆為基礎修訂的大統曆，二為回曆，利瑪竇指出這兩部曆書的內容不精確及過時。利瑪竇的幾個同道也都精通曆法術。1629年，經徐光啟推薦，朝廷委任耶穌會士龍華民 (Longobardo) 和鄧玉函 (Terrenz) 就職於「曆署」。當1630年春鄧玉函死後，湯若望被任命為他的繼承人，他的表現比鄧氏更為優秀。

傳教士們製作天文儀器，並指導中國官員翻譯天文圖表 and 對數表。1643年發生日食時，他們的計算被證明比那些官方曆法師的計算精確得多，朝廷於是同意接受耶穌會士的曆書；但在廷臣中暗地裏頗有反對之意。

當清朝取代明朝時，新王朝的第一位皇帝順治委命湯若望為宮廷曆法師，「曆署」併入了「欽天監」。佔據這些官職的耶穌會士獲賜予俸祿和官邸，而湯若望則如前文提及的那樣在好幾年中獲得了皇帝的寵信和尊敬。然而，當他向康熙皇帝呈上一部二百年的曆書時，卻倒了大霉。一位排外的曆法師楊光先彈劾湯若望的曆書隱射國朝只能持續二百年；楊光先以此口實為契機，指責湯若望在曆算中犯有錯誤及向民眾宣揚謬論。在康熙幼年時專權的鰲拜宣佈湯若望的行為「殊為不妥」，並於1664年後期將他投入了天牢；只是由於皇太后的干預，湯若望才保住了性命。楊光先此時當上了欽天監監正，舊的曆法恢復了使用，但不久後他便在計算日食時出了一次大錯。1665年5月，湯若望被放出監獄，但他已老態龍鍾、身患風癱，一年後就去世了。在1669年楊光先倒臺後，欽天監監正一職給了南懷仁，從此以後以至一直到1838年，該職位都是由洋人佔據。¹⁶

¹⁶ 楊光先在一篇名曰〈不得已書〉的論著中對他的立場作了辯護，他在這篇文章中坦率地宣稱：「寧可使中國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國有西洋人」，且稱「其儀器精者，兵械亦精，適足為我隱患也」云云。此種論調，自屬頑固之言，然以西班牙之征服呂宋及德川幕府初期天主教在日本的影響之驟升為戒，尚可理解。

3. 地理勘測和繪製地圖。1708–1715年間，康熙授權資助法國籍耶穌會士白晉 (Jochin Bouvet) 領一幫傳教士對帝國作了一次地理勘測。依據他們收集的資料，1716年繪製出一套包含中國各省的詳細地圖。康熙自豪地賜該套地圖名曰《皇輿全覽圖》，此乃第一套標有經緯度的中國地圖。
4. 其他活動。耶穌會士還引進了其他一些西學學科。利瑪竇和徐光啟翻譯了歐幾里得 (Euclid) 的《幾何原本》，利瑪竇和李之藻也翻譯了一本數學著作。羅雅穀 (Rho) 和徐光啟翻譯了阿基米德 (Archimede) 的平面幾何和球面三角學論著；艾儒略 (Aleni) 撰寫了有關幾何、球面三角學和地理學的著作；鄧玉函寫了人類生理學論著；徐日昇撰寫了音樂著作；湯若望著述了光學和望遠鏡原理。亞里士多德 (Aristoteles) 哲學和透視繪畫法也介紹了進來。

由於同樣的原因，傳教士們也將漢學傳回了歐洲。繼利瑪竇翻譯了「孔子四書」的義大利文譯本後，又由郭納爵 (Ignatius de Costa)、殷鐸澤 (Prosper Intorcenta) 和柏應理 (Philippus Couplet) 翻譯了一個拉丁文譯本，於1687年在巴黎出版。1682年，柏應理向教皇呈獻了耶穌會士翻譯的四百多部中國典籍譯本。歐洲第一次領略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大學者和大思想家如斯賓諾莎 (Spinoza)、萊布尼茨 (Leibniz)、歌德 (Goethe)、伏爾泰 (Voltaire) 和亞當·斯密 (Adam Smith) 等人成為中華文明的崇拜者。¹⁷ 在啟蒙運動時代，中國人對生活的理性態度和它完全與教會分離的世俗政府，贏得了伏爾泰、霍爾巴赫 (Holbach) 和狄德羅 (Diderot) 的讚譽。在藝術方面，洛可可 (Rococo) 運動把歐洲從路易十四時代矯揉造作的巴羅克 (Baroque) 藝術形式中解放出來，某種程度上也是受中國影響。義大利人、荷蘭人和德意志人仿造了中國式的瓷器。法國出產的中式錦緞成為時髦珍品。帶有石橋、假山和金魚的中國園林大受仰慕，肯特公爵 (Duke of Kent) 的克佐 (Kew) 植物園就特別因其優雅的中國風格而聞名遐邇。

¹⁷ David E. Mungello,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The Search for Accord* (Honolulu, 1977).

中國喪失了現代化的機會 儘管耶穌會士帶來了這些西方文明的樣本，但他們並不是推動中國進行現代化的催化劑。傳教士只是代表了西學的一縷微弱之光，在一小部分較進步的中國士大夫中間隱約閃亮，卻從未照射到其他地方，他們充其量只是給幾乎不可變更的中華文明，帶來了一陣微微的顫抖而已。中國的士大夫總體上對自己的文化遺產自負非凡，以致不承認需要吸收外來學識。

此外，帶來這種科學技術新知識的耶穌會士，本質上是一些宗教人士而非科學家。除了幾十個非常有天賦的人以外，大多數傳教士作為文化傳導者其能力是有限的。與其說他們代表了歐洲文明的寬廣前沿，還不如說他們只介紹了西方科學中少數一些恰好吸引中國人注意力的分支。即便是這種片面的介紹，也在十八世紀中隨著傳教運動被抑制而受到阻隔了。因此，耶穌會士所作努力的微弱、儒家士人所持的種族中心式的自滿姿態，以及中國文化所具有的對外來刺激之不可滲透性，阻礙了中國在此時出現任何現代化的進展。¹⁸

諷刺的是，恰恰就在西學在中國衰微後不久，西方的政治、經濟、社會和科學領域出現了巨大的進展。美國革命、法國革命及英國的一些重大改革，為近代民主制的興起開闢了舞臺，而工業革命則預示了一個技術發展、民族主義、向外擴張、資本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新時代，歐洲上空瀰漫著進步的氣息。與此相反，中國的士人卻在他們「繁華的往昔」裏尋找行動的指南，並專注於古代經籍的研究。歐洲在探索進步的道路上突飛猛進，而中國卻鼾睡在輝煌的夢境裏。把中國從它的睡夢中推醒，需要作出遠比耶穌會士所能作出的更誇張、更猛

¹⁸ 傳教士的局限性在他們自己看來就太明顯了。熊三拔和龍華民作過多次努力想招募一些著名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家，但耶穌會會長卻感到歐洲不能抽出這類天才。該會會長在拒絕三位傑出的數學家——文森特 (Geogory St. Vincent, 1584–1667年)、沙伊納 (Christoper Scheiner, 1575–1650年) 和塞薩特 (John Cysat, 1588–1657年)——前去中國傳教的申請時稱「為上帝之更大榮耀及本會之利益，彼等留居歐洲並大力推進數學研究乃更可取之舉。如此，彼等即可憑藉其在華弟子作彼等無法親身所作之事。」有關詳情參見Pasquale M. D'Elia, *Galileo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1960).

烈的舉動。我們將在後面幾章中看到，在工業革命中遙遙領先的英國，毫不遲疑地接受了這一挑戰。

俄羅斯的推進

大約在西歐人經海路到達中國的時候，俄羅斯人也正在穿越西伯利亞向中國推進。因此，中國是在兩個方向上與歐洲世界碰面。從南面遠航前來的歐洲探險家及商人和從北面經陸路前來的俄國人，他們像一把鉗子一樣逼近了這個從前是難以滲透的帝國，中國的命運從此再也不像以往一樣了。

穿越西伯利亞 征服西伯利亞主要是俄羅斯探險者、冒險家、狩獵人的功績。到十六世紀中葉時，俄羅斯人已抵達了烏拉爾山脈，並爭取到一些部落酋長如埃迪格爾 (Ediger，失必兒汗) 和庫楚恩汗的歸順，而在1554年，伊凡雷帝採用了「全失必兒領主」的稱號。1558年，富商斯特羅加諾夫 (Stroganov) 家族獲沙皇允許，開發烏拉爾山脈以外的地區。1581年，曾經當過土匪後成為斯特羅加諾夫私家軍隊統領的葉爾馬克 (季莫費耶夫 [Vasili Timofeiev])，率800名哥薩克人 (Cossacks) 向東進發，於翌年抵達額爾齊斯河，佔據了失必兒城，西伯利亞的名稱即來源於此。他將佔領的地方連同一批皮毛貢品呈獻給沙皇，以求抵贖過去的錯誤行為。葉爾馬克獲得了一枚獎章並被稱為英雄，他繼續沿額爾齊斯河和鄂畢河向前推進。雖然他在1584年淹死，但東進卻繼續下去。1587年修築了托博爾斯克城，至1590年，俄羅斯政府遷3,000家農戶於西伯利亞西部。1604年，在鄂畢河畔修築了托木斯克城，以此作為西伯利亞的府治，1619年又修築了葉尼塞斯克城。到1628年時，哥薩克人已到達了西伯利亞東部的勒拿河。1632年和1638年分別建造了雅庫茨克和鄂霍次克兩城，從此地又派出幾次繼續向東的探險。1648年，俄國人抵達了堪察加半島和現今所稱的白令海峽，這樣，自葉爾馬克從烏拉爾出發 (1581年) 後不到七十年的時間裏，俄國人就完成了向太平洋推進的探險，征服了四百多萬平方英里的地域。1651年，他們又進抵了貝加爾湖，修築了伊爾庫次克城。

哥薩克人從西伯利亞部民的傳聞中，得知了有「東亞黃金之國」美稱的黑龍江流域肥沃富庶——據說那裏金銀遍地、棉絲如海、牛馬成群、穀糧堆山。因此，有幾次探索性的遠征隊被派往那塊誘人的地方。1658年，葉尼塞斯克的總督帕休可夫 (Pashkov) 到達黑龍江的支流石勒喀河，築尼布楚 (尼爾臣斯克) 城。1666年，一名流亡的波蘭人啟爾哥布斯基 (Nikitor Chernigovskii) 修築了阿爾巴津 (雅克薩) 要塞，他在1669年獲沙皇委命為總管。此時，哥薩克人在黑龍江流域牢牢地盤踞了下來，中國人稱他們為「羅刹」，他們決意進一步深入滿洲。

俄羅斯人的推進與滿洲人在中國的崛起同時發生。雖然清朝的創建者備受羅刹威脅的困擾，而且為此憂心忡忡，但卻不得不推遲採取任何大規模的懲罰措施，因為他們正專心於征服中國及鞏固王朝。只有到了1681年平定「三藩之亂」後，康熙皇帝才騰出手來處理俄羅斯問題。

早期派往中國的外交使團 隨著征服西伯利亞並突入黑龍江地區，俄國人向中國派去了一些試探性的外交使團。俄國人此時對中國的瞭解是相當有限的；一些人認為中國既不龐大也不富有——「統由一道磚牆圍繞，可顯見其無多地域也」。¹⁹ 1618年，沙皇西奧多羅維奇 (Mikhail Theodorovich) 遣托木斯克的菲德林 (Ivan Petlin) 赴北京探訪這個神秘國度的情形；由於他沒有帶來貢品，因而被拒絕陞見。²⁰

1654年，俄羅斯委派第一位使臣白克夫 (Feodor Baikov) 尋找有關到達中國的最佳路線、兩國間的距離及中國人用來交換的貨物之類型；他還要刺探中國的軍事和經濟力量，考察那裏的農產品和寶石。他帶了一份沙皇致「博格德汗 (大汗)」的信函，所謂「博格德汗」乃是俄國人從蒙古人那裏獲悉的對滿洲皇帝的稱呼。白克夫受命要將信函直接呈給博格德汗本人，且在覲見時不得行磕頭禮。頗為滑稽的是，給他的訓令接下去又稱：「無論如何不得 (像中國人那樣) 吻博格德汗的

¹⁹ John F. Baddeley, *Russia, Mongolia, China* (London, 1919), II, 67–68.

²⁰ Baddeley, 83.

腳；但若被要求吻手則毋需拒絕」云云。²¹由於矢口拒絕行中國人要求的禮儀，白克夫未能獲陞見，禮物也被嚴詞退回。白克夫作為一個外交官固然失敗了，但他卻帶回了一些關於中國的「珍貴」情報。

1675年，俄羅斯又派遣了一位神采飛揚的使臣斯帕塞理(Nikolai G. Spathary，其原來的族姓為米勒斯庫)前來尋找通往中國的路徑、探測中國對與俄國關係的反應，以及瞭解有關西伯利亞和中國之間的居民的情況。斯帕塞理乃是一位博學之士，他決意不辱君命。他不肯將沙皇的信函呈遞給中國官員而執意要親手呈給皇帝，並且拒絕將他的禮品稱作貢品。在與禮部僵持了二十六天之後，他最終作了讓步，向康熙行了磕頭禮，隨後康熙在宮中賜宴招待了他。斯帕塞理居北京凡三個半月，未能完成其使命，但他卻從南懷仁處得悉了康熙將為剷除雅克薩和尼布楚而開戰的重要情報。²²

《尼布楚條約》，1689年 隨著「三藩之亂」的平定(1681年)、臺灣抗清運動的平息(1683年)及王朝對中國統治的穩固，康熙著手解決羅刹問題。經過幾年的精心準備，彭春將軍於1685年率10,000士兵、5,000水手和200門火炮從齊齊哈爾出發。面對如此龐大的敵軍，圖爾布青(Aleksei Tolbuzin)統領的450名哥薩克守軍全無取勝機會，不出意料，他們被徹底打垮了。45名俄國人被俘，雅克薩被夷為平地；但圖爾布青卻設法逃到了尼布楚。²³

在蕩平雅克薩後，彭春撤回來了；但不久圖爾布青在336名哥薩克人的幫助下又盤踞到廢墟之上。新的要塞修築了起來。1686年3月，圖爾布青又恢復了對黑龍江的侵襲。康熙再次派軍討伐雅克薩。這一次俄國人頂住了中國人的圍攻達一年多時間，但像前一次一樣，雙方力量對比懸殊，俄國顯得毫無希望。圖爾布青在戰鬥中陣亡，而許多部下則死於疾病。最後，當1687年年中哥薩克人只剩下66名的時候，中國人只要再來一次會攻就可以佔領雅克薩，但是康熙突然下令

²¹ Baddeley, 134, 442.

²² Baddeley, 395–411.

²³ 何秋洵(輯)：《朔方備乘》(北京？，1881年)，第6卷，第16–17頁。

撤圍，而他的將軍薩布素甚至向嗷嗷待哺的哥薩克人提供給養。表面上，皇帝這樣做是因為他從沙皇處得悉一個外交使團已經上路，而實際上他是在尋求機會博取俄國的善意。康熙不想把俄國人逼到與仍未降服的西部蒙古人厄魯特部結盟的地步。此外，在經歷了削平三藩的經年內戰之後，中國也需要休養生息，因此延長與俄羅斯人的戰事不符合它自己的利益。

俄羅斯也絲毫不想開戰，因為：還不是「大帝」的彼得才十來歲，與他那位久病的兄弟同掌皇位；該國專注於在波羅的海的戰事；軍費開支和國內經濟衰敗使國庫空空如也。對俄羅斯來說，執行一項通過貿易接觸對中國作和平滲透的政策，遠比沿黑龍江作赤裸裸的侵略和領土擴張更加可取；因此，它便派出了外交使團。該使團以費要多羅為首，此人是托博爾斯克總督之子。他被授命在色楞格斯克 (Selenginsk) 會晤中國人，努力將邊界線劃在黑龍江和布列亞河 (Bystra) 一線，如果不行，則至少劃在黑龍江和結雅河 (Dzeya) 一線。1687年10月22日，費要多羅抵達了色楞格斯克。

中方使團由一等公索額圖及幾名顯貴率隊，隨行的還有兩名充當翻譯的耶穌會教士張誠 (Jean François Gerbillon) 和徐日昇 (Thomas Pereira)。他們於1688年5月離京，但發現前往色楞格斯克的道路因厄魯特部酋噶爾丹入侵東蒙古人喀爾喀部而被阻隔了，於是選定尼布楚為替代的外交談判地點。康熙皇帝急於獲得俄國的善意和杜絕噶爾丹與俄羅斯人的結盟，於是訓令索額圖說中國可將尼布楚讓給俄國且承認邊界於額爾古納河。在談判中，費要多羅提出要以黑龍江為界，而索額圖則要求俄國人撤出尼布楚和雅克薩，並且放棄色楞格斯克以遠的領土。雙方各執己見，陷入僵局。兩名耶穌會教士在兩方營寨間來回調解，而中國使團則威脅要動武。²⁴ 中國方面有10,000名士兵和90艘戰艦為後盾，而費要多羅手頭僅有1,500名軍隊。俄羅斯人最終讓步了。1689年9月7日簽訂了《尼布楚條約》；擬成了漢、俄、滿、蒙和拉丁語五種文字的版本——以拉丁文版為正本。條約含六條：

²⁴ 關於耶穌會士在條約談判中的作用，參見Joseph Sebes, 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Rome, 1961).

1. 西伯利亞與滿洲里之境界，以入於黑龍江之額爾古納河附近之格爾必齊河，及循此河之水源，遠至東海岸所綿互之外興安嶺山脈為定界。
2. 雅克薩地所建造之堡砦，當悉行毀壞，其所居住之俄國人，當悉攜其財產退回。越界捕獵之獵夫將予嚴懲。
3. 兩國民持旅行免狀時，無論於何地之領土內，得交通以營其貿易。
4. 無論何國人，不得容他國之逃亡者及脫走之兵，而應即行捕俘，交付於境界所在之官衙。
5. 兩國現居他國領土內之人民，仍得居住原處。
6. 兩國間於過去一切之事，當永久忘卻，毋留記憶。

這項條約乃中國與一個「西方」國家之間的第一項協定，它是在中俄平等的基礎上達成的，雙方都大體感到滿意。俄羅斯獲得了對尼布楚城及約93,000平方英里未定領土的控制權，此外還獲得了一些貿易特權；而中國則滿意地看到雅克薩的俄羅斯問題被徹底解決，且俄國將很可能在中國與噶爾丹之間的較量中保持中立。然而，條約中卻有一個大漏洞；蒙古和西伯利亞之間的邊界仍未確定，因為費要多羅堅持稱他沒有得到授權談判這個問題。顯然，俄國是在規避任何對這個問題的安排，因為清王朝還沒有完全控制外蒙古。

隨著《尼布楚條約》的簽訂和羅刹問題的暫時消除，康熙轉而對付厄魯特問題。此後展開了幾年的征戰，其間皇帝的軍隊喪師失地、損傷頗大——一時間噶爾丹進抵離北京不到80里格(240英里)處的烏蘭布通。但戰事基本上懸而未決，沒有哪一方取得多大優勢。最後，決意掃蕩噶爾丹的康熙經過幾年的準備，於1696年發起了一場有80,000人參戰的征討。是年6月12日，噶爾丹被迫在昭莫多決戰。他的騎兵被清軍的火炮和火槍徹底摧毀，心高氣傲的噶爾丹不願投降，率一小幫從人逃離。他於次年即1697年暴卒——可能是服毒自殺。於是康熙將他的統治擴展到了外蒙古和哈密，為他的孫子乾隆皇帝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完成對整個「西域」²⁵的征服奠定了基礎。

²⁵ 「西域」於1768年重新命名為新疆。

《尼布楚條約》最具意義的是，使中俄關係得到了規範。在該條約簽訂後，一些俄羅斯商隊和外交使團進入中國。1693年，以伊德司(E. Izbrandt)為首的俄國使團爭取到中國方面的同意，每三年派一次商隊前來北京。商隊規模限定在200人以內，在北京逗留時間限制為80天；無論他們的貨物是進口貨還是出口貨，都免收關稅。在1698-1718年間，共有十支這樣的商隊前來。1720年，一個由伊斯邁羅夫(Leon V. Izmailov)率領的使團抵達北京，該使節行了三跪九叩的磕頭大禮，條件是將來中國使節前去俄國也將服從該國宮廷的禮儀。²⁶雖然俄國使節得到了康熙的禮遇，但當請求擴展商務及在北京設立一總領事館的要求時，卻不得要領。他在逗留北京三個月後啟程回國，留下隨員蘭給(Lange)繼續談判；十七個月後(1722年)，蘭給因行為乖張而遭驅逐。

圖理琛出使留居俄國的土爾扈特部，1714年 俄國派了幾個使團來華，中國也派了兩個使團赴俄羅斯。但第一個使團不是派往聖彼得堡的俄國宮廷，而是派往伏爾加河的土爾扈特部落。土爾扈特部是厄魯特部的一支，原本居住在塔爾巴哈臺地區，1630年移居俄羅斯。到1654年時，他們已成為了俄羅斯臣民，雖然其部酋繼續定期向中國進貢。1712年，土爾扈特部酋長阿玉奇派了一個朝貢使團來到北京，阿玉奇之女嫁給了厄魯特部新首領、噶爾丹之侄策旺阿拉布丹為妻。康熙決定遣使回訪，表面上是為了表達他對阿玉奇效忠的讚揚，但實際上是為了加強中國與土爾扈特部的關係，並杜絕阿玉奇與策旺阿拉布丹結盟的可能。康熙很可能還想勸說土爾扈特部落歸順中國(該部最終於1770-1771年間歸順了中國)。

這個使團由內閣侍讀圖理琛率領，他於1712年離京，穿越了蒙古和西伯利亞，在那裏得到了西伯利亞總督的善待。1714年，使團抵達了伏爾加河，圖理琛在那裏會晤了阿玉奇。除了友好地互致善意及談

²⁶ Ripa, 105-107.

論從中國交還阿玉奇之侄以外，他們在會晤中還談了什麼卻不得而知。圖理琛回國後寫了一部這次遊歷的記錄，書名為《異域錄》。²⁷

《恰克圖條約》，1727年 圖理琛使團顯然加強了中國與土爾扈特部的聯繫，可能也阻止了阿玉奇與策旺阿拉布丹之間的結盟。但厄魯特人對清王朝的威脅依然存在。策旺阿拉布丹與俄國人之間持續的交往，引起了中國人再度擔憂他們之間會達成什麼密謀。據此，劃定外蒙古與西伯利亞之間邊界的問題——這是《尼布楚條約》懸而未決的問題——便變得加倍重要了。中國的新皇帝雍正執行他父親將蒙古與俄羅斯隔離開來的政策，決定必須通過一項新條約，一攬子解決與俄國的所有未定事宜，從而消除俄國援助厄魯特部或與其建立聯盟的任何藉口。

俄國人也急於解決與中國之間的一些問題，如邊界的劃定、陸路貿易的延伸及在北京設立一宗教使團等。1725年繼承彼得大帝的葉卡德琳娜一世 (Catherine I) 藉口恭賀雍正帝1723年的登基，派遣盧古辛斯基 (Sava Vladislavich Ruguzinski) 以特命全權使節身分前來中國。這個龐大的使團有100人之多，並由1,500名士兵護衛，它經過十三個月的跋涉於1726年10月21日抵達北京。盧方辛斯基是一個圓滑、耐心而又見識卓越之人，從1726年10月到1727年4月之間的六個月裏，他與圖理琛及另外三名中方談判代表會晤了三十次。法國籍耶穌會士巴多明 (Parenin) 充當了兩個談判使團中間的聯絡人，不斷向盧方辛斯基通報中方使團當前的意向。由於此前尚無在北京簽訂條約的先例——與俄國的第一項條約是在邊陲小城尼布楚簽訂的——雙方使團移到了色楞格斯克河支流布拉河地方，在那裏締結了被稱為「布拉協定」的草約，該草約在1727年10月21日修訂成為正式文本，名為《恰克圖條約》。這項含十一條款項的條約的重要條文如下：

²⁷ Tulisen, *Narrative of the Chinese Embassy to the Kahn of the Torgouth, 1712-1715*, tr. by George L. Staunton (London, 1821).

1. 蒙古與西伯利亞之邊界由中俄聯合委員會勘定。邊界從西面的薩彥嶺和沙畢納依嶺延伸至東面的額爾古納河。東面從烏帶河到外興安嶺之間的土地因缺乏精確資料暫置不議，但在其他地方委員會應立即劃定疆界。
2. 除尼布楚現有貿易集市外，允准俄國人在邊界之恰克圖開設貿易。
3. 雙方逃犯應嚴行查拿，各自送交邊吏。
4. 不超過二百人之俄國商隊允准每三年前往北京一次，免納進出口關稅。
5. 俄國得允在北京保持一個有自己教堂的宗教使團，俄國教士及學子得居住北京。
6. 中俄之間的通訊應用雙方政府之印信——中國為理藩院印璽，俄國為薩那特衙門（元老院）或托博爾斯克總督衙門印璽。

在領土安排上，中國喪失了上額爾齊斯河與薩彥嶺之間及貝加爾湖以南和西南約40,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但獲得了看見俄羅斯遠離蒙古諸部的安全感。另一方面，俄國獲得了一些貿易上的讓步及授權在中國設立一宗教使團。但是從前一直與蒙古人進行的邊界貿易，現在限制在尼布楚和恰克圖兩地。

托時和德新的使俄，1729—1732年 儘管《恰克圖條約》解決了許多重大問題，但因它允許兩國間發展更密切的交往而引起了一些新的問題。俄國方面不斷控訴蒙古匪幫侵擾邊境，偷搶馬匹、駱駝和牛羊；也有一些申訴華商欠俄國商人債務不還的怨言。這些事情自然引起了中國方面擔憂俄國是否會在清軍征討厄魯特部時保持中立，其時厄魯特部的頭領是策旺阿拉布丹之子噶爾丹策零，策旺阿拉布丹死於1727年。為得到俄國的保證，雍正皇帝於1729年派遣了一個使團前往俄國，這是一次真正派往聖彼得堡宮廷的外交使團，因此它也是中國派往「西方」國家的第一個使團。

使團由一位滿族記名侍郎托時率領，出使名義是恭賀俄國沙皇彼

得二世(1727–1730年)加冕。當托時於1731年1月抵達莫斯科時，他發現沙皇已駕崩，新君是彼得大帝的一個侄女伊凡諾夫娜(1730–1740年)。俄國人鳴三十一響禮炮歡迎他及熱情延請他至克里姆林宮陛見。托時向俄國宮廷呈獻了十八箱中國皇帝欽賜的精美禮品，並向女沙皇行了馳名的磕頭禮，隨後他向俄國元老院遞呈了一封國書，該國書要求俄國在中國征討厄魯特部時保持中立。他更具體地要求俄國人：(1)若中國士兵在進攻中無意越過俄國邊界，不要採取敵對態度；(2)給予中國追剿逃入俄國境內之厄魯特部軍隊的特權；(3)將厄魯特部酋及貴族引渡給中國而嚴格約束在俄國境內的厄魯特部民，使他們在未來不給中國製造麻煩；(4)允許中國派代表團訪問定居於伏爾加—頓河流域(Volga-Don Valley)的土爾扈特部落，並促使該部回歸其原來的故鄉。中國願割讓部分從厄魯特部那裏攻佔的領土給俄國作為回報。

女沙皇真誠地表示希望與中國保持和平關係，並授權清軍可以追剿逃入俄羅斯境內之厄魯特士兵。此外，她承諾將嚴加管束避難於俄羅斯的厄魯特部民，但拒絕將該部酋和貴族引渡給中國。她還同意讓中國再派一個使團赴土爾扈特部落，但未承諾將來再派使團，因為土爾扈特人已正式成了俄國臣民。

托時居留俄京達兩個月之久。回國途中，他在托木斯克拜會了俄國元老院秘書巴庫甯(Bakunin)，並請求俄國幫助安排一個中國使團前往土耳其，目的是試圖尋求土耳其支持中國管轄它所屬的回民，但巴庫甯對此不置可否。

托時使團的真正目的，顯然是想使俄羅斯在中國行將對厄魯特部發動的戰爭中保持中立，另一個長遠的目標則是確保俄國協助它安排一次赴土耳其的使團。這些都是清朝吞併厄魯特部所控領土的大戰略的組成部分。就目標而言，托時的使命只成功了一部分，即使中俄相互間的態度確實改善了和俄國援助厄魯特人的可能性減少了。後來的事態表明，俄國正忙於波蘭王位繼承戰爭，因而無論如何也不會援助厄魯特人。清朝征討大軍在遭遇了重重困難後，最終於1732年在光顯寺一役中獲勝，這就使中國得以經談判而達成一項和議，但它卻未能徹底解決這個積年的厄魯特問題。

在托時還沒回國之前，北京已決定再派遣一個使團攜帶致女沙皇的合適國書前往俄國。該使團由禮部滿侍郎德新率領，在俄國邊界得到了友好接待，但卻被拒絕派遣代表往土爾扈特部。德新於1732年抵達了俄羅斯新京聖彼得堡，在一場盛大的陛見儀式上呈上了國書，並且行了磕頭禮及獻上了十九箱中國皇帝致送的珍貴禮品。他重申了與托時一樣的請求，也從俄國人那裏得到了相似的答覆。為接待這兩次中國使團，俄國宮廷耗費大量的金錢，分別花去了26,676和22,460盧布。²⁸

俄國在中國的特殊地位 清代初期的中俄關係同中國與其他西歐海權國家的關係迥然相異。事實上，俄國在中國佔據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地位。它是中國唯一與之保持外交關係的國家；唯一派遣外交使團的「西方」國家；也是唯一一個獲得在北京擁有宗教、貿易和教育特權的國家。清朝早期的統治者認識到，俄國的中立對於中國鞏固其北部和西北邊界是至關重要的，而要取得這種中立，就必須給予俄羅斯以一些其他國家所不能享受的優惠和特權。²⁹

儘管清廷堅持俄國使節向中國皇帝磕頭，也儘管中國記載總是把使節說成是貢使，但在《大清會典》五個版本的任何一個版本中，俄羅斯均未被正式列為藩屬國家。事實上，康熙明確表示俄羅斯不應算做藩國：「外邦（俄羅斯）來貢固為一盛事，然朕恐後世行之或成紛擾之源。」在很多場合，康熙給予俄羅斯以一種獨立邦國所應有的尊重。例如，他在1712年遣圖理琛赴俄時即命他「行事悉遵彼國禮儀」。這種訓令從未給過任何派往藩屬國的中國使臣；相反，所有藩屬國王在迎接中國使節時都必須履行中國的禮儀。這種對俄羅斯的特殊尊重還表現

²⁸ Gaston Cahen, "Deux ambassades chinoises en Russie au commencement du XVIII^e siècle," *Revue Historique*, 133:82-89 (1920); 李直方, 〈清雍正皇帝兩次遣使赴俄之迷——十八世紀中葉中俄關係之一幕〉, 台灣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學報》, 第13期, 第39-62頁(1984年6月)。

²⁹ Immanuel C. Y. Hsü, "Russia Special Position in China during the Early Ch'ing Period," *Slavic Review*, 13:4:688 (Dec. 1964).

在1720年康熙與俄使伊斯邁羅夫的交流中。皇帝告訴伊斯邁羅夫，如果他服從中國宮廷的禮節行磕頭禮，那麼，清廷將保證以後中國的赴俄使臣也遵從俄羅斯的禮節。由於伊斯邁羅夫的遵旨，康熙在三個月中延見了他十幾次，以示寵愛，在會晤中，康熙隱隱約約地稱彼得大帝為「其匹」、「友鄰」和「掌遼闊疆域之最尊高之主」。³⁰ 這種表達——甚至是這種情感——從來沒有加諸中國的藩屬國王或任何其他外國君主。當托時和德新在1731-1732年赴俄期間，他們確也向女沙皇磕了頭，這是中國使節從未向任何藩屬國王行過的禮節。

由於中國對俄羅斯之特殊尊重，衍生出了一個頗有意思的後果，即俄國戰俘的待遇。這些戰俘總共約百人，都是在雅克薩之圍前幾次戰鬥中俘虜過來，他們得到了寬赦並編入清軍的一個牛錄——滿軍鑲黃旗第四甲喇第十一牛錄。作為旗人，他們被授予軍爵且有營房駐地。他們每年有一筆俸祿，還允許完全自由地信教。康熙皇帝賜了一座佛廟給他們，他們將它改建成一座東正教堂，稱「聖尼古拉教堂」，後來改名為「聖母升天教堂」。中國人則稱之為「羅刹廟」，而更通行的不太確切的叫法是「北俄羅斯館」。

俄羅斯商人的境況也不錯，他們來華的時間始於1693年的伊德司(Ides)使團，獲准結夥成二百人的商隊每三年來北京一次。他們固然要自己解決來華的川資，但帶來的貨物卻是免課關稅的。在北京期間，他們寄宿於「南俄羅斯館」——是前明的舊「會同館」。按規定他們應在八十天內做完生意及離開北京。但這些規章不過是形同虛設而已，例如，1698年，由連古索夫和薩瓦季耶夫率領的商隊就包括了近三百名商人和二百名帳房、僕役和夥計。在1698-1718年間，有十個這類商隊前來北京，平均為每兩年一次，而不是如官方規定的每三年一次，並且他們還經常獲准居留北京超過法定的八十天期限。有時，中國宮廷甚至還向那些虧了本的俄國商人提供貸款。

在1727年的《恰克圖條約》之後，俄羅斯教士團隊獲准每十年來北

³⁰ Gaston Cahen, *Histoire des relations de la Russie avec la Chine sous Pierre le Grand, 1869-1730* (Paris, 1911), 165.

京一次，為這裏的俄羅斯人佈道，並由中國政府提供他們的川資和住宿費用。在1729到1859年間，有十三個這類的使團來到了北京。教士們住在南俄羅斯館，並且在那裏保持了一座稱為「聖燭庵」的教堂，該教堂後來重新起名為「聖母滌罪教堂」。1729年以後，宗教使團的教士也在「聖尼古拉教堂」做彌撒。

《恰克圖條約》允許俄國派學生前來北京學習漢文和滿文。1728年，一所教習俄羅斯人的語言學堂作為南俄羅斯館中的一個單獨機構落成了。俄羅斯學生前來作為期十年的學習，中國人承擔他們的路費和膳宿費，但要求他們穿著由理藩院提供的中式服裝；禮部提供食物，國子監則指派一名漢人和一名滿人教授語言。這座學堂還附有一些塾師。同樣地，中國政府也感到有必要教習俄文。理藩院從八旗子弟中挑選了24名學子來學習五年的俄文和拉丁文。五年的學期結束時將舉行考試，兩名學業最優者將授予八品或九品銜的官職。

憑藉這些宗教、教育和貿易特權，俄國在諸國中一枝獨秀地在中國的京城建立了一個立足點。這些特權以及由此帶出的特殊地位延續了很久，即使在十八世紀五十年代乾隆成功地鞏固了帝國、從而不再需要俄國的中立以後，也沒有取消。只有到了1861年，當北京向英國、法國、美國的外交代表開放時，才打破俄國的壟斷地位。

俄國在中國之特殊地位的意義是不應被低估的，俄國駐北京宗教使團和語言學堂的成員能夠從內部觀察中國，直接地研究中國的語言、政治和社會及經濟結構。他們比其他西方人能夠更早地發現清王朝的力量和弱點。他們也許是唯一一批理解中國人心態的外國人。他們目睹了滿清政權逐步地衰敗，而他們給本國政府的報告則有助於指導俄國的對華政策。他們在回國後開始進行或許是歐洲最早的系統性漢學研究，早於其他任何西方國家好幾十年。³¹

³¹ R. K. I. Quedstedt,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Kuala Lumpur, 1968), 24-29; 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臺北，1957年），第20-21頁。另見 Eric Widmer,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76).

參考書目

- Allan, Charles W.,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Peking* (Shanghai, 1935).
- Baddeley, John F., *Russia, Mongolia, and China* (London, 1919), II.
- Bernard, Henri, S. J., *Matteo Ricci's Scientific Contributions to China*, tr. by Edward C. Werner (Peiping, 1935).
- Chang, T'ien-tse, *Sino-Portuguese Trade from 1514 to 1644: A Synthesis of Portuguese and Chinese Sources* (Leiden, 1969).
- 張蔭麟：〈明清之際西學輸入中國考略〉，《清華學報》，第1卷第1期，第38-69頁（1923年6月）。
- Ch'en, Agnes Fang-chih, "Chinese Frontier Diplomacy: the Coming of Russians and the Treaty of Nerchinsk,"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4:2:99-149 (Feb. 1949).
- , "Chinese Frontier Diplomacy: Kiakhta Boundary Treaties and Agreements," *The Yenching of Social Studies*, 4:2:151-205 (Feb. 1949).
- 陳復光：《有清一代之中俄關係》（昆明，1947年），第1-2章。
- Ch'en, Kenneth, "Matteo Ricci's Contribution to and Influence on Geographical Knowledge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59:325-359, 509 (1939).
- 陳受頤：〈明末清初耶穌會士的儒教觀及其反應〉，《國學季刊》，5:2:1-64（1935）。
- Ch'en, Vincent, *Sin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The Hague, 1966).
- Cheng, Tien-fong, *A Histor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Washington, D.C., 1957) chs. 2-3.
- 朱謙之：《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長沙，1940年）。
- Cranmer-Byng, J. L., "The Chinese Attitude Towards Exter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Canadian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XXI:4:57-77 (Winter 1966).
- Dunne, George H., S. J., *Generation of Giants: The Story of the Jesuits in China in the Last Decades of the Ming Dynasty* (Notre Dame, 1962).
- 方豪：《李之藻研究》（臺北，1966年）。
- Fu, Lo-shu, *A Documentary Chronicle of Sino-Western Relations, 1644-1820* (Tuscon, 1966), 2 vols.

- Gallagher, Louis J., S. J.,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The Journal of Matteo Ricci, 1583–1610* (New York, 1953).
- Golder, F. A., *Russian Expansion on the Pacific, 1641–1850* (Cleveland, 1914).
- Harris, George L., "The Mission of Matteo Ricci, S. J.: A Case Study of an Effort at Guided Culture Change in China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Monumenta Serica*, XXV:1–168 (1966).
- Hibbert, Eloise T., *Jesuit Adventure in China During the Reign of K'ang Hsi* (New York, 1941).
- 蕭一山：《清代通史》，修訂本（臺北，1962年），第1卷，第22–25章。
- 徐宗澤：《明清間耶穌會士譯著提要》（臺北，1958年）。
- Lach, Donald F.,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 The Century of Discovery* (Chicago, 1965).
- , *Asia in the Making of Europe, Vol. II: A Century of Wonder, Book One: The Visual Arts* (1970); *Book Two: The Literary Arts* (1978); *Book Three: The Scholarly Disciplines* (1978); (Chicago, 1970, 1978, 1978 respectively).
- 劉選民：〈中俄早期貿易考〉，《燕京學報》，第25卷，第151–212頁（1939年6月）。
- Mancall, Mark, *China at the Center: Three Hundred Year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1984).
- , *Russia and China: Their Diplomatic Relations to 1728* (Cambridge, Mass., 1971).
- Masini, Federico (ed.), *Western Humanistic Culture Presented to China by Jesuit Missionaries (XVII–XVIII Centuries)* (Rome, 1996).
- Meng, Ssu-ming, "The E-lo-ssu Kuan [Russian Hostel] in Pek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23:19–46 (1960–61).
- Mungello, David E., *Leibniz and Confucianism: The Search for Accord* (Honolulu, 1977).
- Quested, R. K. I., *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 1857–1860* (Kuala Lumpur, 1968).
- , *Sino-Russian Relations: A Short History* (London, 1984).
- Ravenstein, E. G., *The Russians on the Amur; Its Discovery, Conquest, and Colonization* (London, 1861).
- Ricci, Matteo, S. J.,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Lord of Heaven* (天主實義), tr. by

- Douglas Lancashire and Peter Hu Kuo-cheu, S. J., Chinese-English edition by Edward J. Malatesta, S. J. (St. Louis, 1985).
- Rosso, A. S., O.F.M., *Apostolic Legations to China of the Eighteenth Century* (South Pasadena, 1948).
- Rouleau, Francis A., S.J., "Maillard de Tournon, Papal Legate at the Court of Peking," *Archivum Historicum Societatis Iesu*, 31:264-323 (1962).
- Rowbotham, Arnold H., *Missionary and Mandarin: 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 (Berkeley, 1942).
- Sebes, Joseph, S. J., *The Jesuits and the Sino-Russian Treaty of Nerchinsk (1689)* (Rome, 1961).
- Souza, George Bryan, *The Survival of Empire: Portuguese Trade and Society in China and the South China Sea, 1630-1754* (Cambridge, Eng., 1986).
- Spence, Jonathan D., *The Memory Palace of Matteo Ricci* (New York, 1984).
- 王之相、劉澤榮：《故宮俄文史料》（北京，1936年）。
- 王萍：《西方曆算學之輸入》（臺北，1966年）。
- Widmer, Eric, *The Russian Ecclesiastical Mission in Peking during the Eigh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Mass., 1976).
- Wills, John E., Jr.,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si, 1666-1687* (Cambridge, Mass., 1984).
- , *Pepper, Guns, and Parleys: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and China, 1662-1681* (Cambridge, Mass., 1974).
- Wu, Aitchan K., *China and the Soviet Union: A Study of Sino-Russian Relations* (New York, 1950).
- 吳相湘：《俄帝侵略中國史》（臺北，1957年），第一及二章。



努爾哈赤 (1559-1626年)



康熙帝 (1662-1722年)



雍正帝 (1723-1735年)



乾隆帝 (1736-1795年)